

常瀛生 著

北京土话中的满语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现在的北京话中，仍频繁地使用满语词。这是老少皆知的事情。

H172.1

5

89243 CDS 75710 18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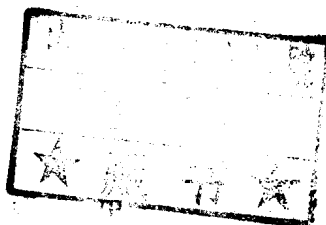
北京土话中的满语

爱新觉罗·瀛生 著



200074007

DJ33 / 23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9 号

北 京 土 话 中 的 满 语

爱新觉罗·瀛生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大32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7.8125 字数 194 千字

1993 年 7 月北京第一版 1993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402-0548-2/H·0014

印数: 1—2000 定价: 5.75 元

自序

距今四十五年前，从莘田师学习语音之学。师生二人都是旗人，闲谈不免涉及北京话和满语。有一天谈到北京话有句歇后语：“粮食店搬家——斗（都）是你的”。“都”（dou）在沈阳话里读上声，才与“斗”字叶音。如照北京话读，“都”字读阴平，与“斗”不叶音，这句歇后语就不成立了。说明这句歇后语出自清初随满人入关的八旗汉军之口。由此引起莘田师谈了一些有关现代北京话的形成和发展的问題。话是零星地谈的，归结起来大体是：（1）北方汉语因在与北方民族语相接触中发展，以至与古汉语形成很大距离。（2）幽州语、幽燕语、大都话是在契丹语、女真语等的影响下形成的。至于明代，大都话受诸地汉语方言影响而形成明代北京话。（3）清初八旗汉军将辽东语带到北京，形成清代北京话。（4）清代北京话受满语影响很大。莘田师指教说，看看清初满人口中的元代白话碑式的汉语，就知道《红楼梦》研究者所感到的特殊味道是从何而来的了。

这是个很有意思又有意义的问题，四十多年来从未离开我的脑子。但是由于工作的安排，这四十多年来我一直跟洋文打交道。1986年离开了工作岗位，闲下来了，这才得踏下心好好想想这个问题，遵照老师指出的路子，读了一些古今诸贤的著述，写成一部小稿。此次多蒙燕山出版社不弃，给这本小册子以出版的机会，得就正于广大读者，实称幸事。

限于个人学识浅陋，这本小册子里一定有许多欠妥甚至错误，更多挂一漏万，语焉不详之处，敬希读者不吝赐教，多多指正。

著者

1990年12月

前 言

从汉语发展史看，北方汉语的发展与北方民族语的互相影响是分不开的。北京话源自唐代幽州语，历宋、辽、金诸代，在契丹语、女真语的影响下，形成了幽燕语。至元代，在幽燕语的基础上形成了元大都话。由于辽、金时代北方汉族人，特别是幽燕之民，大量迁入东北地区，原居东北地区的契丹、女真诸族人大量移居中原，所以幽燕语与契丹语和女真语关系密切。现存的女真文所写的书写物中，含有许多汉语借词，明确地证明幽燕汉语对女真语言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影响。

明政权建立后，元大都话受到许多种方言的影响，特别是明洪武、永乐时代由各地向北京地区大量移民，并带来大批兵士、官吏、匠人、差役等各项人员，自然带来各地方言。这样，就在元大都话的基础上形成了明代北京话。明代北京话是当时通行于北京城区和近郊的语言。

清初满族人入关，带来了大量八旗汉军，以及隶属于八旗满洲的包衣佐领和旗鼓佐领。八旗汉军是汉族人，自然是讲汉语的。包衣佐领中，汉族人约占三分之一，旗鼓佐领则将近百分之百是汉族人，这些人也是说汉语的。清（先称后金）政权在关外编立的八旗汉军，包衣佐领中的汉族人、旗鼓佐领的汉族人，以明代辽东人为主体的，他们说的是明代辽东语。明代的辽东是汉族人居住区，其地域是：南起旅顺，北至开原，西起山海关，东至鸭绿江。明代这个辽东地区归山东按察使司管理。清初入关的八旗汉军，包衣佐领、旗鼓佐领等汉族人绝大多数是明辽东地区的汉族人，所以说的是明代辽东语，就是受了女真语影响的幽燕语。

明代辽东语源自幽燕语。它与现在河北省东北部靠山海关一带地区的汉语方言有密切的血缘关系。人们常将河北省东北部靠近山海关一带的方言称为“冀东话”、“唐山话”、“昌滦乐话”

（昌黎、滦县、乐亭以及相邻诸县的话）。明代的辽东语出自汉军旗人之口，常被人称为“沈阳语”。这种辽东语（沈阳语）随着满族入关而进入北京，与原来通行于北京地区的明代北京话相融合，形成清代北京话。清初满族人学习汉语，对汉语有所影响，至雍、乾、嘉时代形成早期北京话，可从《红楼梦》的语言窥其概貌。至于道、咸、同时代而形成的“旗人话”，即后期北京话，从《儿女英雄传》的语言可见其大体。现代北京话就这样形成了。北京话里有大量满语借词，也说明满语的影响是很大的。

目 录

自序	III
前言	V
一、绪说	1
(一) 北方汉语与北方民族语	7
(二) 宋、辽、金、元时代的北方汉语	23
二、北京话	39
(一) 北京话概说	40
(二) 北京话语音概貌	47
(三) 北京话语词举例	52
(四) 轻声、歇后语及其它	73
三、现代北京话的前身	84
(一) 从幽燕语到大都话再到明代北京话	85
(二) 东北地区的幽燕汉语	91
(1) 宋、辽、金、元东北地区的汉语	92
(2) 明代东北地区的汉语——辽东语	111
四、现代北京话的形成和发展	123
(一) 八旗组织中的汉族成员	123
(二) 沈阳语与满语	127
(三) 满语概说	154
(四) 清初北京的满语式汉语	180
(五) 北京话的发展	196
(1) 雍、乾、嘉时期的北京话	197
(2) 道、咸、同时期的北京话	210
(六) 北京话里的满语词	224

一、绪 说

汉语北方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在历史上，北方方言区域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占极重要的地位。北方话就是“官话”，它具有很强的内部一致性。北方话内部具有大体一致的语法；词大体相同；其语音系统具有主要的共同特点。北方汉语内部有如此的一致性，但仍可分为几个次方言区，此不细谈。

从汉语方言的发展史看，可以分为上古时期、中古时期、近代和现代。

（一）上古时期。周秦（公元前11—3世纪）和两汉（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时代，有大量氏族和部落存在，即所谓“国”和“诸侯”，他们各有语言是可想见的。《尚书·舜典》有“蛮夷猾夏”之说，《左传》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之语。《论语》有“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无也”等等。这大量“蛮夷华夏”的说法，说明语言不同。夏属中原羌族，殷人是东夷族，这在史学研究中已成定论。直到秦统一以前，中原黄河流域的居民几经变迁，其语言（或方言）必然是复杂的。及至周代后期，即春秋战国时期，部落互相兼并而融合，小的方言必随之而合并为较大的方言。于是在诸多方言存在的情况下，以王畿成周的方言为主要基础而产生了“雅言”。雅言可以说是极早期形成的汉语共同的文学语言。《论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但是必须注意雅言的形成决不意味着方言受到削弱。

孟子活动于战国时代，那时汉语的方言仍极复杂。孟子是邹人，许行是楚人，孟子说许行是“南蛮舛舌之人”。孟子从自己

的语言出发，而说许行讲的楚语为“缺舌”。孟子曾对戴不胜说：楚人打算学习齐语，是应以齐人为师呢，还是应以楚人为师呢？戴不胜答称“使齐人傅之”。孟子又说“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嶽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孟子此言之旨原是强调环境作用力量之大，以学习语言比拟，说只要把学语之人置于该语的语言环境中，过数年的时间必然掌握了该语言。我们这里不谈语言环境的问题，而是由此明显看出战国时代汉语有方言之分，而且方言间差异十分明显巨大，齐方言与楚方言之区别是如此，秦方言与晋方言的差别也不小于此。《左传》中记载着：晋人恐秦人任用河东人士会将 对晋不利，就派魏寿餘到秦国诈降。寿餘请求派河东人同去，秦只得同意，因为寿餘与士会是同乡，操同样的方言。这些说明那时汉语存在方言的差异，人们必须在语言环境中才能学得自己乡音以外的另种方言。《礼记》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的序中说“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都说明上古汉语的方言存在是事实，而且方言众多，语音差异大。

先秦时代语言状况复杂。中原的华夏语言有众多方言，其差异之大至于互不通晓的地步。华夏以外的蛮夷戎狄，各有其语言，互不通晓。但华夏诸方语言也有彼此可通的。例如古籍所载，《左传·襄公十四年》有这样的话：“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言语不达。”《吕氏春秋·知化篇》说“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夫吴之与越也，……习俗同，言语通。”《吕氏春秋·为欲篇》说“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皆说明（1）夷狄与华夏语言不通；（2）华夏语言有方言之别，有互通者，有彼此不相通者。这是确实的事实。可见先秦时代的古汉语有很大的方言差异，同时可知彼时四夷各有其语言，不同于华言。

秦统一全国，影响了汉语的发展。“书同文”是文字的一致化，秦方言必随之而推广，但决不是诸方言受到削弱。郑玄说由于学习和使用文字的“非一邦之人”，所以“人用其乡，同字异

音，同音异字，于兹随生矣。”这说明文字虽然一致化了，但学习和使用文字者是各地的人，人们各依其乡音发声，所以字虽同而音不必尽同。可见秦的“书同文”措施并未能触及方言，方言仍然存在。从另一方面看，文字的统一深深地影响了汉语以后长时期的发展。

《诗经》来自广大地域，有方言之分，其韵与后来的韵颇有不合处。一则是由于音韵随时代前进而有变易，二则是方言的作用。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公羊多齐语，淮南多楚语”，也说明方言之异。到了汉初，虽距周末和秦代时间不远，但已对先秦典籍的语言有不解之处，学者为此而建立训诂学。这充分说明汉语在时代前进中发生不断的变化。两汉时期方言明显有别，汉代著作中的反映即可说明这一事实，例如刘熙多青徐语，许慎多汝南语，郑康成多齐语，《汉书》注多陇西秦语等等，都说明两汉的方言差异。研究这一时代的汉语方言状况，主要依据是《方言》和《说文》，此二书资料丰富。后世的研究者曾据此而提出下列几种西汉方言，即：秦晋，郑韩周，梁，西楚，齐鲁，赵魏西北，魏卫宋，陈郑之东，楚之中部，东齐和徐，吴扬越，荆楚，南楚，西秦，燕代。至今关于少数民族语与古代汉语方言的关系仍缺少研究，例如东齐青徐语与夷语之间有什么关系，秦方言与羌狄语有什么互相作用，南楚语怎么与南蛮语互相影响，北燕方言与东胡语有什么联系等等，都欠研讨。在《说文》和《尔雅》注中，一说“东夷谓息为咽”，一说“东齐呼息为咽”。东齐语是古汉语之一方言，而东夷语则是少数民族语言之一。它们都将“息”说成“咽”，可见汉语方言与其邻近的少数民族语不无关系。

总地说，上古时期经济和政治的变动，引起方言的分合，例如秦晋二方言至西汉时期渐渐合而为一。上古汉语虽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而发展，但现今存在的吴语、湘语、粤语也开始萌发。可以认为古楚语是构成今湘语的前身之一，三国时期的吴越楚方言有互相趋近之势。

(二) 中古时期。公元7—13世纪为中古时期，即隋、唐、

宋三代。这个时代之前，即由上古过渡到中古时代，发生了一件极堪重视而影响极大的事件，就是汉族以外的部落进入中原。历史上所谓“五胡”就是鲜卑、匈奴、羯、氐、羌，他们皆非操汉语的部族，大量进入中原，而且居处多年，且在政治、经济上曾占重要地位，因此其语言不可能不影响汉语；忽视这个重大影响因素而观察汉语的发展，是错误的。纵然汉语保持稳定的发展，但受这些非汉语的影响则是消磨不掉的印迹；可以说汉语是在接受了这个影响的状况下向前发展的。汉族中有一部分，特别是门第高贵的望族向江南迁移，古汉语随之而南迁，现今粤、闽语中颇含古韵，即其明证。大部分汉族仍留故地，其语言与少数民族语互相影响并发生融合，使北方汉语发生了新貌。杨恭恒在《客话本字》中说“客之先，居丰镐河洛齐鲁之交，或为衣冠世族……。自东晋永嘉五胡蹂躏……，于是衣冠之族……相与挈家渡江……。王谢旧河东太原人也。其余入闽著姓，则有林邵何胡等八家。……其它流民避乱江南……有南徐南司等州郡……。”这是永嘉时代的汉族南迁；至唐代，又发生一次南迁。金破宋，中原汉族又一次南迁。

我们不妨借用日语汉字音读的古音、吴音与汉音等之别，从另一侧面以窥古代汉语音韵概貌。事实上，由于汉字和汉语进入日本的时代不同，传自何地不同，致使日语汉字读音有古音、吴音、汉音、唐音（宋音）之别。当然，不论日语汉字的哪种读音，决不会与古代某时期中国某地域的汉字读音完全一致，但我们确是可从日语汉字音而窥中国古汉语音。

（1）古音。日本语言研究的成果确实证明日语的汉字读音中有古音的遗迹。古音比吴音传入日本的时代更早，据某些研究者之论，认为日语汉字音读的古音是于中国周、秦时代传入日本的。关于这个主张虽仍有争议，但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承认。古音字数量不大，常举出的有：

巷（ソ）	意（オ）	宜（カ）
居（ケ）	台（ト）	耐（ト）

明(マ) 已(ヨ) 里(ロ)

日本语研究者认为这些汉字音读(古音)与中国周、秦时代的汉字读音有关。这些古音见于日本古代文献和地名中,认为是早在吴音传入日本之前,于中国周、秦时代传到日本的。在现代日本语中,有些地名和人名汉字的读音,既非吴音亦非汉音,也不是唐音(宋音),其实可能就是古音。例如“英”字,吴音读“ヤウ”,汉音读“エイ”,但这个“英”字还在少数情况下读作“ア”。又如“寧”字,吴音为“ニャウ”,汉音为“デイ”,但还偶有读“ナ”的。这里,“英”字的“ア”音,“寧”字的“ナ”音,皆为特殊读法,可能就是古音,是依中国周、秦时代的音而读的。这是多数研究者的意见。

(2) 吴音。有人从这个“吴”字而认为日本语的吴音是来自中国江浙一带的音,其实这是误解。《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载,倭国于隋大业三年遣使朝贡,使者说“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其国书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日本语“吴”字是“クレ”,就是使者所说的“海西”和国书所写的“日没处”,也就是“西方”的意思。日本自称“日出处”就是“东方”之意。因此,不要把“吴音”的这个“吴”字理解为中国江浙一带,也不是非指中国南方不可,而是泛指中国,即“西方的国家”(日本国位于东)之意。据研究,吴音是经由朝鲜而传至日本的。日语汉字音读的吴音词不少与佛教有关。

(3) 汉音。据研究,这是公元7世纪左右日本派到中国来的遣唐使和留学僧带到日本的。汉音传入是在日本奈良时代末至平安时代,一般认为它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广大地域的汉字音。对于这个“汉”字,也应看成表示中国,并不确切地表示某一时代和地域。

(4) 唐音。也称为宋音或唐宋音。中国宋、元、明时代相当于日本的镰仓和室町时代,中国禅宗僧人和商人将当时的汉字音带至日本。日本语的唐音词与佛教禅宗有关者不少。禅宗对日

本文化影响甚巨，除佛教外，武士道、茶道等皆与禅宗有关。此外还有些生活用语也读唐音。“唐”字也不表示中国唐代，而也是表示中国。

总地说，古音尚待深入研究，吴音进入日本的时间比汉音早，吴音代表古汉语音，汉音则明确代表七八世纪中国西部和西北部（以长安为中心）的汉语音。此二者之别，恰好从另一侧面反映古汉语（更主要的是中古汉语）的面貌和变化。略举数字为例，由吴音与汉音之别，以窥汉语音之变。

汉字	吴音	汉音	汉字	吴音	汉音
保	ホ	ホウ	惠	エ	ケイ
兄	キョウ	ケイ	望	モウ	ボウ
兵	ヒョウ	ヘイ	格	キャク	カク
冷	リョウ	レイ	治	ジ	チ
分	ブン	フン	皇	オウ	コウ
勸	カン	ケン	的	ダク	テキ

在不同时代由不同地域，汉字传至日本，日本人依该时代和地域的汉字音以形成日语汉字的音读。由此可以明显看出汉语音不断在变化中，唐代以长安为中心的汉语音，与日语吴音所表现的音相异甚大，说明汉语在发展前进中变化甚大。借用日语汉字音读，很能表现汉语音韵的变化，特别是表现中古时期的汉语音。这个差异也表现当时中国南部与北部有方言之别。

（三）近现代时期。自公元 14 世纪至 19 世纪划为近代时期，鸦片战争后（1840 年以后）划为现代时期。自公元 14 世纪至 19 世纪，汉语在几经分合变化之后，分出几种主要的方言：北方方言、吴语、湘语、客语（客家语）、粤语、闽语。有人提出另有赣语也是一支独立的方言，但因它尚缺独立的方言特征，姑存之。前已讲过，汉语的吴、湘、粤诸方言开始萌芽于上古，闽、客诸语萌发于中古。北方方言则向南向北扩展，成为近代汉语的主体方言；曾称为“官话”的语言实即现在所谓“普通话”的基础。北方方言在汉语诸方言中是使用范围最广的。

元周德清编著《中原音韵》一书，实为研究北方汉语方言的重要依据。书中明确总结出北方方言的主要语音特点，就是平分阴阳、入归他声、声母无清浊之别。这也就是现代汉语的基本面貌，也是它成为独立方言的突出特点。另一方面，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客话等等，则保存许多秦、汉、隋、唐的旧有音韵的残余。为什么呢？原因当然不仅一个，这里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先秦的语言到了汉代已经与当时的口语脱离。现在人们皆知本世纪20年代曾有“文言”文向“语体”文的改变，所谓“文言”，实即脱离口语的古汉语。公元12—13世纪，有一种新的书面语出现，它大体与口语一致，口头怎样说，文字就怎样写。唐代佛教禅宗僧人用这种口语写文，宋代禅家因之。宋代的理学家也用这种口语体写了不少文章。这种语言以北方方言为主体，改变了周秦至于汉代及以后的古汉语的许多特点，终于形成做为现代汉语共同语的基础的北方方言。可以这样说，北方方言的平分阴阳、入归他声、声母不分清浊，这三大特点的形成，均与北方民族语言的影响有关系。吴、粤、闽、客诸方言之所以或多或少地保存着秦、汉、隋、唐古汉语音韵的残余，与它们未受或极少受北方民族语言的影响有关系。

（一）北方汉语与北方民族语

北方汉语方言形成于中国北方，后由于诸种原因而被带到国内许多地区，形成几个次方言区。（1）北方方言（狭义的北方方言）即北方话，过去曾叫“官话”或“北方官话”。其分布地域是北京、天津、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东北三省，内蒙古一些地区也用这种方言。胶东半岛的方言自有特点。（2）西北方言又称西北官话，分布于山西省、陕西省、甘肃和宁夏以及青海省，内蒙古一部分地区也操此方言。（3）西南方言，过去长时期

称之为西南官话，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河南南部、湖南西北较小地区，广西西北部也用西南方言。(4)江淮方言，旧称下江官话，分布于皖北和苏北，长江以南如镇江之西和九江以东的地区也用此方言。这四个次方言区中，狭义的北方方言（北方话）地区和西北方言地区是这一方言的形成地（发源地），西南方言和江淮方言这两个次方言区，则是因种种因素由其形成地被带到那里的。携带方言的因素，包括军事行动和军队驻防、商业活动、人口大批迁移及其它。

北方方言形成的地域，是与西北、北、东北诸民族地区接壤之地，是诸民族语言相交际、相混合之地。北方方言的形成与这些汉语以外的诸语言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由于这些非汉语诸语言的影响，使北方方言发生不少偏离古汉语音韵之处。当然北方方言的形成还受着其它因素的制约，兹不述及。这里先谈谈北方方言的音韵特点，然后谈其与非汉语诸语的关系。这些非汉语诸语大多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是没有声调的语言。北方汉语长期与这些无声调语言接触，受到影响，因而使北方方言的声调大异于古汉语，入声消失了。但是吴、粤、闽诸方言则因未受这个因素的影响，所以其声调与古汉语虽也有别，但差异不太大，仍保存入声。

北方汉语方言在声母方面的特点是（1）[f]、[x]分而不混或有条件地相混。（2）[n]、[l]分而不混。混而不分者只占少数。

（3）尖团音以不分为主，分者为次。例如“精经”是不分尖团音的，但较少地区有尖团之别。（4）“解”和“懈”类的音，大多数地区读[tɕie]、[ɕie]，只有西南次方言区读作[kai]（[tɕiai]）、[xai]（[ɕiai]）。（5）西北次方言区有[pf]音声母，但从整体北方方言比较看，这仍属次要现象。如“猪”读作[Phu]，还有“书”读作[fu]及其它皆属此类。（6）区分[ts]、[tsʰ]、[s]和[tɕ]、[tɕʰ]、[ɕ]者占大多数，不分者是东北、西南、西北、江淮次方言区。

（7）大部分地区用[ʒ]或[Z]表示“日”声母。此外还有些次要情况。（8）北京话开口零声母在一些次方言区为零声母，也

可以是鼻音声母。北京话齐齿零声母，在一些次方言区或为零声母，或为鼻音声母。北京合口零声母在各次方言区大多是零声母。北京撮口零声母在各次方言区皆同。东北地区有人将零声母呼为〔ʒ〕，那是为了避免东北方言音而趋就京音，泛用零声母与〔ʒ〕的交换，从而产生的误谬。例如将“言”说成〔ʒan〕，“勇”说成〔ʒuŋ〕等等。除此以外，有些次方言区有些声母特异之点，兹不述及。

北方汉语方言在韵母方面的特点是：（1）合口韵在不同次方言区中，有多有少，甚至多少悬殊。例如北京话里有大量合口韵，西南次方言则合口韵极少。（2）北方方言是四呼皆全的，但如昆明（云南和贵州）撮口呼多变为齐齿呼。（3）卷舌元音〔ɤ〕，古“日”母在北方方言中绝大多数是零声母。西南次方言区有读〔ə〕、〔ei〕等音的。（4）部分地区有复元音单元音化现象发生，如北京话的〔ou〕在云南大理读〔o〕。（5）大部分地区皆能分别〔n〕与〔ŋ〕。西北次方言区多〔ŋ〕，西南次方言区则不能分〔n〕与〔ŋ〕，少〔ŋ〕多〔n〕。（6）北方方言各区大多无入声。古入声分入其它声调，导致古入声韵变化。（7）北方方言有儿化韵，各地儿化不同。（8）北方汉语各次方言区的声调并不相同。在有入声的地区，入声有分阴、阳的。入声的归属也不一致，例如北京话，古全浊归入阳平，古次浊归入去声，古清入归属无定。（9）各地大多有轻声，也有变调，但其规律不同。例如北京话的轻声甚为重要，西南次方言区则不如此。各地皆有依不同规律而发生的变调。

以上极简略地概述北方方言各次方言区的声母和韵母。本书既非专著，古汉语又非重点内容，而只是为讲北方话与北方诸族语的关系而作必要的简略介绍而已。

仅从以上极简略的概述中即可明显看出一点：汉语北方方言较其它汉语方言距古汉语音韵远，差别大。其它方言在不同程度上较多地保存着古汉语的音韵。以古汉语为标准，观察汉语北方方言以外的诸方言，发现它们皆不同程度地保存古汉语的音韵，

惟独北方方言的音韵堪称面目全非，自成一派。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北方方言是在乌拉尔阿尔泰诸语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要了解这个问题，只要看看广大北方地区与这些少数民族的关系史，一切皆可真相大白。

汉初距先秦为时并不太远，秦汉距春秋战国时间很近。可是到了汉初，不但先秦的古汉语已相当严重地脱离口语，就连春秋战国时代的古汉语已有多处为当时人所难解，甚至不解。这充分说明汉语发生了极大变化。这个变化就发生于北方，发生于北方汉语，那些“南蛮缺舌”之人的语言则并未发生这样显著的变化。只因北方地区自古就与一些阿尔泰语系的民族地区为近邻，古华夏族与“戎狄”不但久为邻居，而且交错而居，华夏戎狄共处的局面为时已久。春秋时代以“尊王攘夷”为霸者之业。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孔子这句话本是赞扬管仲完成了“尊王攘夷”的大业，另方面使我们看出“夷”是多么众多，其势力是何等强大。只有出了管仲这位伟大的人物，才免得孔子和众多华夏百姓随了“夷俗”。“披发左衽”等夷俗虽免，但语言的影响和继之而来的融合，则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着，出入于口角之间，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顺其自然地接受下来，并传播开去。管仲能“攘”夷，但是“攘”不了语音之变。华夏族的人们虽然仍依旧俗而穿右大襟的上衣，但口头间却变了音声。“夷俗”可被管仲攘掉，但“夷音”的影响是不会被攘掉的。

北方诸族与华夏族来到北方地区的时间先后，史无定论，但据史册所载，北方诸族久已居于这一地域。例如《史记》中有黄帝北逐荤粥的记述。到了夏代，荤粥与夏族紧处为邻，交往密切。殷商以鬼方为劲敌，双方多次交战。古史所记，周的先人受狄人侵扰而率众迁移以避之，说“昔者太王居豳，狄人侵之。”于是太王“率西水浒，至于岐山之下。”振兴农业，发展壮大。传至姬发，统众伐纣，建周以代殷。周的祖先是中原羌人之裔，他们居豳地与狄为邻，是明显可证的事实。西周的獫狁强盛，《诗经》记载着“獫狁孔炽，我是用急”的话，周人在六月本是农忙之际，